

中国

现代语言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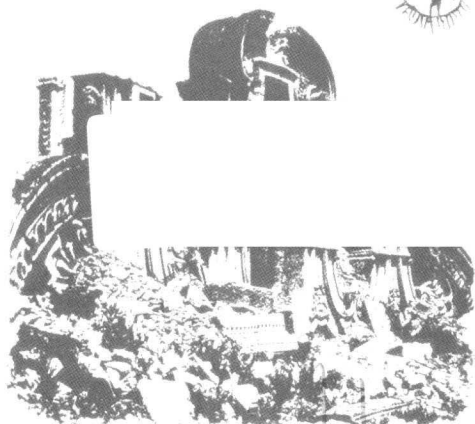
何九盈／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 何九盈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 —3 版.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 4

ISBN 7-5406-5832-0

I. 中… II. 何… III. 汉语史—现代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6824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 823 号粤景工业园第一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5 印张 500 000 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3 版 2005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6001-9000 册

ISBN 7-5406-5832-0/H·108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现代语文运动	(13)
概况	(13)
第一节 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	(15)
第二节 现代标准汉语的确立	(29)
第三节 汉语拼音化的发展过程	(39)
第四节 普通语言学的介绍	(61)
第二章 语法学	(73)
概况	(73)
第五节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80)
第六节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109)
第七节 古今语法比较研究	(139)
第八节 文法革新问题	(168)
第九节 汉语语法理论研究	(190)
第十节 文言虚字工具书	(229)
第三章 音韵学	(233)
概况	(233)
第十一节 上古音研究	(239)
第十二节 中古音研究	(303)
第十三节 北音学的建立	(362)

第十四节	“国音学”和北京音系研究	(381)
第十五节	等韵源流的研究	(391)
第十六节	音韵学史与概论性的著作	(407)
第四章	方言学	(412)
概况		(412)
第十七节	方言分区	(418)
第十八节	方言考古	(423)
第十九节	方言调查	(436)
第五章	汉字学	(453)
概况		(453)
第二十节	古文字研究	(459)
第二十一节	《说文》研究	(467)
第二十二节	汉字改革	(489)
第二十三节	文字学史和概论性的著作	(494)
第六章	训诂学与辞书编纂	(501)
概况		(501)
第二十四节	训诂理论的建立	(503)
第二十五节	词源研究	(509)
第二十六节	经籍旧音考辨	(538)
第二十七节	古辞书研究	(544)
第二十八节	辞书编纂	(550)
第二十九节	训诂学史和概论性的著作	(560)
第七章	修辞学	(565)
概况		(565)
第三十节	修辞理论研究	(568)
第三十一节	修辞格研究	(578)
第八章	非汉语语言文字学	(582)

概况	(582)
第三十二节 中国境内语言的谱系分类	(585)
第三十三节 非汉语语言调查	(593)
第三十四节 非汉语文字研究	(609)
第三十五节 非汉语古语言考证	(626)
全书结语	(639)
后记	(646)
跋	(648)
人名索引	(651)
参考文献	(681)
重印后记	(683)

绪 论

中国语言学史是属于学术史性质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要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渊源、流派，探索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规律，对中国历史上产生的语言学著作进行科学的、客观的评价，从而促进我国语言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般来说，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有人起来进行总结。总结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理论概括，一种是历史评价。学术史的研究就属于后一种性质的总结。这种总结之所以必要，我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学术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认识史，是一部通过学术实践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中国语言学史就是中国历代语言学家对中国境内的语言（主要是汉语）不断加深认识的发展历史。这种认识跟一般认识规律一样，总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为了促使这种认识运动向更高级、更深入的阶段转化，我们就要自觉地对前人的学术实践及其认识路线，乃至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加以总结。其实，凡是有突出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们都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的历史状况进行过清算，并在清算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实践路线、方向、方法。这种“清算”就是一种认识活动。

第二，学术史也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学术研究当然要

立足于现实，要面向未来，但学术传统不能割断。不仅不能割断，而且要继承和发扬那些有积极意义的学术成果、学术风气。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又说：“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①。”贯通古今，贯通历史与现实，是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尤其重要。学术史的责任就是要实现这种“贯通”，为愿意“博古通今”的人设一方便之门。

第三，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种非常有影响的学术主张、观点、体系、方法，往往是对某一学术领域的传统观念、传统学风进行挑战的产物。但是，它本身往往又是不完善的，甚至于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正确与错误纠缠在一起。它的必然的命运就是招来无止无休的批评，而批评者的学术修养、文化素质并不一定比被批评者高明。这种学术是非，只能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让学术史来作结论了。这种“结论”也可能不是个别人或个别著作单独作出来的，而是由于文化背景的改变，由于学术观念的更新，人们找到了重新评价的正确标准。

在学术发展过程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一种学术观点，或者一部学术著作，它自身虽有一定价值，但由于舆论界的过分赞扬，也可以造成“轰动效应”，“受到一致好评”。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同一时代的人评价同一时代的学术著作，有利也有弊。利的方面是思想、语言一般不会有障碍，比较容易把握对方的观点、方法。弊的方面主要是存在共同的时代局限，加之感情作用、不健康的个人意识，都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当然，后人为前人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写历史，也会出现各色各样的问题。为了尽量少出偏差，我以为应坚持三条原则：

第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点。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之下的产物，离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学术上的功过是非。

第二，学术观点的对立矛盾，不统一，有争议，这是正常现象，是学术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学术史不应该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调和矛盾，更不应该无原则的抑此扬彼，党同伐异，偏主一家之言。黄宗羲写学术史有一条原则：“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论，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②可见，他是很看重矛盾对立的，不赞同用一把尺子，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复杂的学术分歧。

第三，全面占有材料，直接研究原始材料，绝忌人云亦云，断章取义。据说，西方治学严谨的学者有这样一条金科玉律：“绝对不引证自己没有从头到尾读过的一本书。”这种精神也就是强调要全面地、系统地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历史著作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尽量用原始材料说话。作为学术史，也应该高度重视原始材料的引证，万不可用空洞的议论来代替原始材料的分析。

以上所谈是从一般意义上说明学术史得以产生的原因和研究学术史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因为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还处在“开步走”的阶段，我们弄清这些一般道理就很有必要。

“中国语言学史”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我们主张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研究。第一个大阶段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这方面我写过一本讲义，已于1985年出版。现经增补，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是第二个大阶段的内容，即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对“现代语言学”这个名称，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现代语言学和西方所说的现代语言学，在时代上大体差不多，而内涵不完全一样。

西方现代语言学是跟传统语法学和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对而言的。它的根本特点是由纵向研究过渡到横向研究，也

就是由历史的研究转变为平面的研究。提出这种新理论体系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 De Saussure) 成为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当我们说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时候, 实际上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现代的语言学, 二是指语言学的现代化。

“现代的语言学”是对古代的语言学而言的, 强调的重点是历史时期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而“语言学的现代化”指的是观点、方法的转变, 指的是学科本身的革新。从总趋势而言, 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历史, 就是中国语言学逐渐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但是, 跟西方现代语言学相比, 我们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带有补课的性质。泰西的“葛郎玛”, 历史比较法,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 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所以,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如填补各项空白, 搜集、整理语言资料, 发展应用语言学, 对传统语言学的继承和改造, 等等。到上半世纪40年代末期为止,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有了一个比较像样但并不十分坚实的基础。

具体来说, 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个人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科学化、社会化、理论化。

所谓科学化就是明确了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彻底摆脱了经学习气; 明确了语言有一个独特的系统, 它不仅有音、有义, 而且有自己的结构规律, 那种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的观念不再有什么影响了; 根据语言内部系统的不同产生了明确的专业分工, 这种专业分工有益于语言学内部各个分支的建立, 有益于这些学科分支的发展, 至于有人成为分工的奴隶, 陷入片面化的泥坑, 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

社会化的内容是双向的。一方面语言学要为社会服务, 要走

向社会调查语言，要为社会制定语言政策、文字政策；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又推动语言学的发展。中国语言学不再只是面向书本，不再只是面向古代，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自生自灭的一门学问，也不再是少数语言爱好者从个人兴趣出发所从事的个人事业。中国语言学家已经自觉地认识到：“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营造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语文学会之发起与成立》，见《国文月刊》55期，1947年）民国时代，官方也成立了语言文字的专门研究机构，许多高等学校开设了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课程，个别大学还创办了语言学系，现代语言学家差不多都是大学教师或语言文字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这门学科在半个世纪之内就有如此长足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这种变革给语言文字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是密切相关的。

比起古代语言学来，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水平已经有很大的提高，至少在传播介绍西方语言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与科学化、社会化相比，与西方语言学相比，理论化的程度还很差。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③。”中国的语言学一直未能登上最高峰，与理论思维的缺乏有直接关系。中国没有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家，也没有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理论著作。恐怕不仅语言学界如此，其他人文学科似乎也很难说谁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孔老夫子不算，因为他是古人），登上了最高峰。还是恩格斯说得对：“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④。”我们的“历史”如何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切是非“折中于夫子”，极端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实践，各门学科缺乏起码的材料

准备，哪来的理论思维呢！就语言学科而言，过去没有像样的理论体系，现在也没有形成浓厚的理论思维的风气，中国人想在语言理论阵地上真正登上“最高峰”，恐怕还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践吧，理论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中国语言学为什么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兴起的原因，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密切关系。这种变革的深远意义可能我们现在还认识得不透。从历史上来看，这种社会变革所造成的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上的质变，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可与之媲美。仅仅“科学”、“民主”这一对概念的输入，就如同石破天惊，为新世纪的新文化埋下了不朽的奠基石，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从此无可奈何地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性的句号。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封建制度的极端腐朽和传统文化的落后，逐渐暴露于世。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冷眼向洋看世界”。19世纪40年代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⑤”，80年代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发生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1905年度科举，1919年“五四”狂飙从天落，封建文化受到摧毁性的打击。今天看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未免有点片面，但从解放思想，批判以经学为主体的旧文化的角度来说，意义不可低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一批又一批留日、留欧、留美的青年学生，是批判旧传统、旧文化，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开路先锋。“五四”前后，“真是人才辈出，百花争艳，可以说是‘汉之得人，于斯为盛’”。就是这些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现代化的中国语言学家，马建忠、章炳麟、王国维、赵元任、李方桂、陈望道、罗常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都直

接或间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中国现代语言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的第一本奠基之作，它的第一批大师，就与西方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称清末到解放以前为“西学东渐时期”，认为“直到解放以前，除了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中国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⑦”。这样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实际。

由于1949年以前的语言学一直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于是有人误以为现代语言学完全是从西方移植进来的，并认为中国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化。我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中西两种文化相碰撞的产物。传统的旧文化与外来的新文化相碰撞，总免不了要出些偏差。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蔑视传统，根据西洋语言学的标准苛求古人，贬斥传统语言学；但也有人站在守旧的立场上，宣称“八部书外皆狗屁^⑧”，讥讽新派“务为夸诞，怪旧艺而善野言^⑨”。这两种偏向，都不是主流，而且也是难以避免的。何只是语言学界，当时的整个文化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林语堂说：“一面想见贤思齐，力图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的文物，又求保守……保守自信与见贤思齐两种心理，都未可厚非。不过保守自信易流于抱残守缺，顽固迂腐，两者相去，间不容发，一不小心，便入迷途；见贤思齐又易流于盲目崇拜，趋新惊奇，彼此之间，岂易鉴别？”（《今文八弊》）

冯友兰在30年代也探讨过中西文化相遇的规律。他说：“他必须把面临的新文化和固有的旧文化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并不是相互不理解的，而是相互理解的。二者在相互理解的同时，也还 有所批评。在用旧文化来理解新文化，或者用新文化来理解旧文化的过程中，有时不能不根据旧文化来批评新文化，有时又不能不根据新文化来批评旧文化。这种情况是东西文化在中国相遇的

自然产物^⑩。”

关于语言学领域里的中西结合问题，前辈论述颇多，这里只引用吕叔湘、邢公畹的看法。

吕叔湘说：“第一个问题中和外的关系，也就是中西结合问题……语言学上的中西结合有一定成绩，但是还不很圆满……西方语言学闯进中国可以说是从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开始，以后又有基督教（新教）教士用拉丁字拼写汉语方言，这些对于清末民初的切音字运动都有影响。语法方面，从19世纪末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一直受到西方语法学的影响。我觉得，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古音的构拟上，因为把传统的声类韵类的研究跟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方言的结果结合起来，就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跟这个比较起来，语法研究的成绩就要差些，很可能就是因为套用现成结果多了些，钻研方法少了些^⑪。”

邢公畹说：“先进的西方语言科学能够‘移植’进来（不是生搬硬套），说明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具有可以接受这些先进理论的‘内因’。换句话说，先进的西方语言理论只有跟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和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形成语言科学的中国方面^⑫。”

我以为还有一点应该明确，所谓中国传统语言学和语言学传统，二者是有区别的。前一个“传统”是着眼于时间，着眼于历史分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语言学在清朝末年已经走向终结。而当我们讲语言学的传统时，这个“传统”是指古代语言学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有深远影响的内在要素，包括古人创造的优秀成果、重要结论、良好学风，等等。这个“传统”不仅不能丢，而且现代语言学家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运用

现代语言学的知识、手段、工具、概念，对历史上的优秀成果进行解释、评价、利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古为今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建忠、章炳麟、杨树达、赵元任、黎锦熙、李方桂、罗常培、王力等人在继承发扬传统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不仅看不出有什么“鸿沟”，反而觉得他们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这是从主导方面来说的。“典范”也会有缺点、错误，请不要要求全责备。何况，当我们谈论前人的某种“错误”时，还应该想想，这种“错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对学术发展是否有过积极意义呢？英国著名数学家兼哲学家 A.N. 怀德海（Whitehead）在《数学与善》的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那个时代，甚至著名的数学家总要假定：对空间的概念，只有一个一致的理解……数学的目的就是对这个惟一的、一致的空间概念作出恰当的表述。这个观点在大约两千四百年中，作为任何物理科学的必要基础曾占统治地位。现在我们知道，它是错误的，但这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错误。因为要是没有把这个简化了的假定作为科学思维的基础，我们的现代物理学就会没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简化，可是现代物理学正是借助于这种简化才能表达自己。

这样，上述错误把学术向前推进，直到 19 世纪末。可是在 19 世纪末，它却成了恰当表达科学思想的障碍。

（《数学与文化》4 页）

我们往往不会正确地分析“错误”，尤其不善于认识具有“伟大意义的错误”，更不能理解错误也可以把学术向前推进。怀德海的这段话颇具启发性。我认为，对中西结合问题上的某些错误亦当作如是观。

我在前面列举了几位典范，这也不只是个人的看法。且听听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是怎样评价赵元任等人的吧。高氏 1936 年为《中国音韵学研究》写的赠序说：“中国新兴的一班学者，他们的才力学识既比得上清代的大师如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孙诒让、吴大澂，同时又能充分运用近代文史语言学的新工具。”所谓“才力学识”加上“新工具”，就是中西结合很成功的表现。

不妨再举一例。王力先生去世后，1986 年 7 月 5 日台湾《中国时报》登了一篇悼念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赞词：“他的深厚文史背景使他有能力直入古书的殿堂汲取史料，消化史料。他的西方学术背景，使他有能力在新的理论指引下迈越前人的贡献……在这方面最要紧的是，作为国学研究所的学生，他并不迷信古人，作为一个留学西欧的学者，他并不盲目跟随洋人。简言之，他能自出胸臆，‘批判性地继承’古今中外各家之长而不为所惑。”王力本人也一再强调：“最近五十年来，中国语言学各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成就，那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③。”又说：“五四运动以后，汉语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并没有其他的奥妙，只不过是把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汉语研究上^④。”

上半世纪的语言学家们在中西结合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要总结现代语言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最为突出的特点。那种把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的观点，把中西语言学割裂开来看问题的方法，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在理论认识上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关键在于我们的前辈是抱着自己的传统和汉语的固有特点去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的。更何况汉语研究早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从 19 世纪末开始就有不少西方人对汉语进行研究。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对汉语各种特点的深刻揭示，也只有在中外语言相比较的基础上才可望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中国语言学走向现代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语文运动的兴起，教育制度的革新，专门研究人才的出现，等等。另外，新材料的发现，新问题的提出，也使中国语言学出现了新的潮流。“当光绪之季，我国古文字古器物大出，其荦荦大者，若安阳之甲骨，敦煌塞上之简牍，莫高窟之卷轴……塞内外诸古国，若西夏若突厥若回鹘，远之若修利若兜佉罗若身毒，其文字器物，亦出于我西北二垂^⑤。”尤其是甲骨文、敦煌藏书的发现，都是文化史、语言学史上的大事。正如陈寅恪所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敦煌劫余录序》^⑥）

末了，我们还谈一下现代语言学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清末至北洋军阀时期（1912至1927年为北洋军阀时期）为一个阶段，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至1949年为一个阶段。

作为第一阶段标志的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和1906年章炳麟明确提出“语言文字之学”这个崭新的学科名称^⑦。这两件事情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阶段缺乏统一的标志，各个分支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方言学可以1928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为起点，语法学一般都以1936年王力的《中国文法学初探》为起点，修辞学以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为起点。

从1898年到1949年总共只有半个世纪，时间并不算长，所以全书只按专题分章，没有必要分两阶段来谈。1949年以后为